



编者按：本期刊发的“青年会论文”系2018年5月12—13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五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优秀论文。

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 (1942—1945)

内容摘要 抗战期间的整风运动，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则被视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整风中的典型。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其中，太行区党委党校的四期整风班，特别是第二、三两期为整风的关键。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却也结合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其间虽因审干出现一些偏误，在收束问题上也未尽顺利，但领导人总体上保持了冷静和理智，可谓“失焦而不失控”。

关键词 整风 中国共产党 太行根据地 干部 李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史领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的针对党内思想、作风问题的“整风运动”是颇引人关注的论题，也产生了一批优秀论著。^① 依托既往研究，我们对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共高层整风的来龙去脉有了大体了解，但对影响范围更广、涉及人群更多的各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则几乎还停留于部分地方党史、史志资料的笼统叙述或是个别老干部的追忆与感慨。可以说，国内外关于抗战期间中共整风运动的相关实证研究最近一段时间进展不大。尽管有部分青年学者做出有益探索，但仍未真正深入整风运动之内里。^② 不得不承认，我们至今还是不知道各地整风运动到底怎么“整”？参加整风的干部在运动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整风在一般干部群体内影响范围有多大？

本文并不着意于重审延安整风运动之总体面貌，而把注意力放在太行根据地。笔者希望以档案史料为基础，结合部分已刊史料，以太行整风最关键的前三期区党委党校整风班为线索，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做一具体研究^③，借此探究中共整风运动地方实践之内里，将整风运动研究逐渐

^①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针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动因、开展过程、内在逻辑等问题，有详实而深入的研究。既有研究多把目光主要投向延安，侧重研究高层政治运作及上层之党文化，对更大规模、影响范围更广的各根据地的整风则着墨甚少。

^② 如程斯宇的《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因主题及各种因素所限，本文并不准备将讨论范围延伸至根据地领导层。

实相化。当然,本文止步于勾勒太行整风之大体轮廓,未作过多横向、纵向之延展。因此,关于华北其他根据地整风运动之情形,或太行整风中不同类型干部的不同遭际、整风期间干部们的思想境况、整风之成效等问题,未来将另文讨论。

一、从“似整非整”到“二次发动”:太行整风运动初起

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曾回忆道:“1942年,是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一年。太行根据地在1941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又遭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再加上这一年的严重旱灾,使这一年成为太行区抗日战争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①也就在这一年,延安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著名的整顿“三风”报告。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②2月八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而4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则正式提出要以“思想革命”的方式在党内全面展开整风运动。^③

2月中旬,太行根据地的领导人看到了毛泽东的两篇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也随即发出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教育的指示。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从4月1日开始用半个月时间举行党八股检查大会。4月1日,北方局对领导分工进行调整,专门指定由李雪峰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领导整风学习活动,着手检查及统计各机关的“三风”问题。第二天,李雪峰在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上向200多名干部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要求全边区在整顿“三风”中形成一个热烈的运动,举行由上而下、由全体到局部、由工作到个人的大检查。^④

但是,太行根据地的干部们“对运动的目的、意义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未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很快就进入检查纠正不正之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查自纠停留在就事论事上”。^⑤

太行区党委发现了这一偏向,在1942年4月15日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不过该指示虽然“拟拿出一年时间,检查全区‘三风’”,却认为从4月1日到4月15日为止,以区党委和同级机关自身检查“三风”为内容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深入下层,逐级检查,最后到群众中去”。所以,在他们眼里,此时的“整风”仍是围绕现实工作的,核心是要“检查中心工作,就必须看发动组织群众如何,因之必须坚持政策,以检查土地政策为中心,检查减租减息,负担,村财政,‘三三制’和村政权”。^⑥

为推动整风,太行根据地成立了整风学习总会,在各地委设立分会。根据地的领导人显然对延安整风的情况还不大了解。他们大概凭着自己的理解,将整风比较生硬地规划为三阶段:第一阶段

①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②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40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367页。

④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86—188页。

⑤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88页。

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1942年4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1942.1—1942.1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49—250页。

整学风,第二阶段整文风,第三阶段整党风。1942年8月初,整风学习总会催促各地“在9月底前将学风文风全盘综合研究完毕,于十月初正式进入党风学习,以期于明春内将全部整风学习任务完成”。^①其间,根据地党组织和一二九师党委在涉县温村区党委党校办了个“干部整风学习实验班”。该实验班集中了190余名县、团级干部,从1942年5月一直办到9月,但实际效果似乎比较有限。这期实验班的一位学员后来即在参加地委的整风时表示:“参加区党委整风班报到后,先是遇到五月大扫荡,至七月初才重新开始整风学习,又渡荒而参与劳动,学习、讨论、自我分析一段就放回来了。”^②

从1942年5月至1943年春季之前,太行根据地的整风大致呈现出三个特点:书本化、功能化和零散化。

“书本化”即是指整风中督促干部学习中央学委提供的“二十二个文件”,虽然上级党组织也强调学习过程要联系实际,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干部停留于“啃字句、啃名词的初级阶段”,以至于这种整风令人感觉枯燥乏味。^③而且,在反扫荡的严峻形势下,广大干部很难有心思去苦读文件,更何况大量工农干部根本读不懂国内外的理论文章。对此,晋冀豫区党委批评干部们将整风思想革命的重大意义“平凡化、抽象化、教条化”了。^④

“功能化”即强调将整风与具体现实中的各项工作联结在一起,对整风本身的定位不够高。太行根据地的各级干部们,此时常常以“整风”来为具体工作服务,甚至依附于实际工作,这与具体整顿形式上的“书本化”并不矛盾。比如某县在减租减息工作上没能完成任务,便准备“整整风,然后把土地政策执行好”。^⑤这种想法并非中下层干部才有,即使是根据地的领导大致也是如此思路。鉴于1941年冬黎城发生离卦道暴动,太行根据地领导人即认为有必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便效法延安举办的文艺座谈会,在太行根据地也召开了一个文化人的座谈会,意图整顿文风。但座谈会开了三天时间,只是提出和初步展开了讨论,许多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实际上是虎头蛇尾。^⑥

“零散化”是指这一阶段的整风在时间上“时紧时缓”,^⑦在空间和参与范围上也是各自为政。尽管区党委也办了所谓“实验班”,但一般看来,初期的太行整风基本是把指示发下去,听凭各地、县、机构和部门自己去整。这样一来,相对具有一定“超越精神”的中上层干部尚好,逐渐兴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让他们在“自我批评会”上有机会接受有关整风效果的“訾议”。例如太行一地委1942年后半年的“自我批评会”上即会有关于自己整风心得的检讨,太行一地委宣传部部长赵武成即表示自己最近“整风反省差”,而根据地委组织部部长周璧的发言来看,包括他在内的部分地委级干部已经在撰写“整风笔记”。^⑧到了县级以下干部群体中,本来过于分散且文化程度较低,再加上反扫荡、减租减息、扩兵,整风自然只能往后排。这一时期的整风还多是按照过去思想教育的老套路偶尔开会学习、讨论而已。

①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学习总会关于整风运动的第三次决定》(1942年8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以下简称“晋档”),A01/03/001/017。

② 《太行二地委整风班笔记》(1944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3/02/004/001。

③ 《晋冀豫区农救总会关于过去一月整风总结和今后的工作指示》(1942年5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16。

④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学习总会关于整风运动的第三次决定》(1942年8月9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17。

⑤ 《晋冀豫区农救总会关于过去一月整风总结和今后的工作指示》(1942年5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16。

⑥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1页。

⑦ 参见王定坤《太行根据地党的建设综述》,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⑧ 《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记录》(1942年12月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2/01/03/005。

于是,在1942年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太行整风形成了一种“似整非整”的态势。虽然整风的指示、文件发了不少,但并无太多实质性进展。1942年底,太行根据地的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前期整风的弊端,他们在照顾干部部分散且部分干部文化政治水平太低的前提下,决定将此次整风收缩为每期只确定一两个中心问题进行整风学习和检查。比如1943年一、二两个月确定了六份要学习的文件,将问题集中到个人英雄主义、统一领导等方面。不过,这种调整没有改变整风“功能化”的状况,地方党委依旧把这两个月的整风与近期的群众运动直接联系起来,希望借此推动正在进行中的“减租减息”。^①

太行整风真正大规模开展的直接推力来自于上级党组织。1942年夏,由于反扫荡形势严峻,根据地分割状态加剧,中共中央一度考虑在八路军总部撤往晋西北的同时取消北方局,而在太行根据地专设太行分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党委的工作。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书记邓小平对此持不同意见。^②在彭、邓等人的努力下,北方局最终被保留下,但同时设立太行分局作为北方局派出机构。^③太行分局书记由邓小平担任,副书记是老资格的李大章^④,委员有刘伯承、李雪峰、蔡树藩。其中,李雪峰担任组织部部长,负责具体指导整风运动。实际上,太行分局主要还是依托太行区党委(起初称“晋冀豫区党委”)开展工作,两级机构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均合署办公。区党委党校也升格为太行分局党校,准备继续举办整风班。曾任太行区党校校长、时任太行二地委副书记的冷楚被调回分局党校任党委书记、副校长^⑤,此前的太行区党校校长贾久民改任副职。这一人事调整,是对党校整风工作的加强。

在1943年初召开的温村会议^⑥上,太行根据地的整风工作遭到上级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彭德怀在代表北方局作大会报告时谈道:“去年整风运动,由于敌人‘扫荡’与我们主观上未抓紧时间进行,由于对整风认识不够,因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一年来本区整风运动还非常差。”彭德怀在发言中措辞激烈,提出要将整风重点放在高级干部中,并重点批评了干部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彭德怀已明确将整风与审干联系在一起,他对过去的审干并不满意,称:“整顿‘三风’运动,应该联系着审查干部工作,整顿‘三风’是审查干部的最好的办法之一,能从思想上了解干部;过去有些地方的审查干部,犯了严重的形式主义,要干部背着包袱来听审,粗枝大叶谈谈话,即作为审查了干部;这种办法不是审查干部,而是对于审查干部的讽刺。”^⑦

不过温村会议初期的论题重点并不在整风运动。据李雪峰回忆,会议期间,邓小平曾收到中央询问整风情况的电报。太行分局因此召开会议对整风学习情况进行研究,这才“决定在1943年把整风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由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亲自领导”。^⑧

在温村会议上,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对前一阶段的整风“进行了检讨性的总结”。随后,太行分局开会专门研究如何具体开展整风学习的问题。至此,太行区党委对整风运动进行了“再发

① 《晋冀豫区党委关于1943年1、2两月整风的指示》(1942年12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04。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③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书中将太行分局委员李雪峰误作“彭雪枫”,这是因为中央来电中有时也将李雪峰简称“雪枫”。

④ 李大章曾任刘少奇秘书、北方局秘书长,此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兼太行分局宣传部部长。参见卢耸岗、彭亚新主编《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109页。

⑤ 校长由李雪峰兼任。

⑥ 即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

⑦ 《彭德怀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1943年2月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1943.1—1943.1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5—99页。

⑧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4页。

动”,按照李雪峰自己的话说是“从头开始”。温村会议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李雪峰等人拟定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并在1943年3月13日正式发往各地。^①这一计划基本采取了推倒重来的态度,要求“过去所有整风计划均须于3月底争取告一段落”,自4月1日至10月开启新一轮整风。

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主要有:

一是整风对象。在1943年4月到10月的整风中,“重点仍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军队中旅与分区以上之领导”,县级与军队团、营以及干部的分量要轻,地方党分委与军队连级干部只是进行“初步的整风”。^②干部队伍具体被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种,依次为:分局、师、区党委一级;地委、旅、分区、专署及分局、师、边府、区党委直属机关中部、科、处级干部;县、团、营与地委、旅、分区、专署一级直属机关中科以上干部;分委与连级干部。

二是整风具体组织方式。该计划明确了以各级党委(县级以上)为核心,结合同级党、政、军、民主要负责干部共同组成整风委员会(以下简称“整委会”),替代过去的“整风学习总会”。各级整委会之间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是经过下级党委实现,且主要是思想上的领导,但也有向下级整委会进行督促、检查、审阅笔记、答复问题的义务。从这一部分内容看,太行分局并无冻结地方党委,以整委会临时接掌部分党务工作的意图,这与延安整风是有区别的。但上述四种干部,均在分级基础上按业务不同被编入各整风小组。

当时,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成员为邓小平(主任)、李大章(副主任)、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毛齐华、杨珏10人。除前面5人为分局领导成员外,其他各具代表性:李达、黄镇分别为太行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原二地委书记赖若愚此时已升任太行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是李雪峰至为信赖的干部。毛齐华的进入值得关注,他名义上担任区党委秘书长,兼管工会。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被专门派遣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曾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回国后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是上海特科中的功勋人物。从其兼管敌工部工作,后来又调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来看,毛齐华应是区党委公安保卫、敌工情报方面的主要领导者。^③杨珏时任五地委委员、城[敌]工部部长,之前曾担任晋东南工人总会主席,是毛齐华的下级,他被选择进入十分重要的整委会,应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工会负责人被结合进来,以此彰显整风之思想价值取向;二是杨珏很可能也是此区情报系统的重要负责人,借此身份被选入委员会,与毛齐华搭档,因为他在整风运动后期即被调到处于边沿区的、斗争形势最为胶着的七地委担任城工部长,负责指导此地区之隐蔽战线工作。^④

三是整风中的学习重点和进度。该计划并未提到根据地领导层的整风计划,而表示要“另订之”。其详细安排的是地级干部为代表的“乙种干部”,学习安排以“星期”为单位具体设计,但学风、党风分别为三个月、两个月,而文风的学习只有两星期,可见整风重点在“打通思想”。对于层级更低的“丙、丁两种干部”,则内容要简单、通俗些。^⑤

①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1943年3月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209—216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1943年3月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209页。

③ 晋冀豫区(太行区)党委社会部部长长期由李雪峰兼任,但极少有材料透露社会部或太行根据地情报系统具体由谁负责领导。毛齐华个人情况,参见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④ 参见杨珏《回忆太行五地委的一些情况》,《中共林县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56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1943年3月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211、213—214页。整风运动具体之学习内容及干部之阅读体验值得专门考察,但篇幅所限,留待以后讨论。

二、过渡中的转向：党校第一期整风班

在新的整风计划出台前，邓小平曾向李雪峰提出，“鉴于冀南根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如果让冀南区党委在冀南根据地内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会有许多困难，因此要把冀南干部集中到太行山中，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带有休养与避难性质”。^① 1943年3月12日，太行分局决定，1943年3月至1944年3月，在一年的时间内，县级以上干部要轮流到分局党校集中进行整风学习，首先要办的便是太行、冀南两区的县级干部整风班。^②

仓促中，一批冀南区的干部被集中到太行分局党校，与部分太行区的干部混编一处，办了第一期整风班。这些干部被分为两个班级：一是太行、冀南两区县级以上干部的整风班，一是冀南区委干部的分批整训班。^③ 就其中太行区的学员来源看，主要是县委常委、县长、公安局局长、农救会主席等。整风班的学习分三个阶段，即：综合性文件学习阶段，由李大章负责指导；学风文件学习阶段，由邓小平指导；党风文件学习阶段，由李雪峰指导。^④ 这个整风班后来也被称为太行根据地的“第一期整风班”。

在笔者看来，太行分局党校办的第一期整风班基本可视作太行整风由酝酿期向开展期的过渡，从此期整风班开始，干部整顿由过去以组织整顿为特征的关门整党逐渐转变为以思想整顿为核心的开门整风。

依根据地领导人计划，此期整风班的核心目标是发动干部“自我反省、改正问题”，因此整风学习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学习文件后，联系实际工作开展“自我反省”，且以大会、小组会作为自我反省的“公开、扩大、展开”。但总的来说，此期整风班的“群众运动”特征较弱，而强调一般之“自我批评”。整风领导者提出此期整风是要干部们“学习如何批评与自我批评”。尽管，他们认为“整风就是要进行思想斗争”，却专门提醒这次整风不是过去所谓的“斗争会”。^⑤

于是，尽管整风班里也会组织积极分子首先在大会上汇报，但并不以大讨论的方式营造思想氛围，还是多停留于以组织训诫的方式给予政治压力。鉴于此，李雪峰认为第一期整风班“办的比较死板，民主没有很好发扬，联系实际揭发批评不够，讨论中多数发言表现为概念式或工作汇报式”。^⑥ 可以说，此时太行根据地党的领导人对整风的理解多少有些犹豫而含混。比如，他们对干部间相互批评过程提的要求是：“要耐心、勇敢和有组织的进行，首先是友好。”^⑦ 这就是要求干部们既要秉着善意，又要尖锐批评，还要促使批评对象自己交代内心深处的问题。

不过，此期整风班“思想斗争”的组织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以往。对那些“落后分子”，整风班在小组会讨论时采取个别谈话、劝告、批评与鼓励等方式帮助他们反省。在小组会之前，整风班领导会对积极分子进行组织、动员，让他们有的充当整风对象的“盟友”，有的“持友好态度”，有的则“负责质问”。整风班领导希望以这种办法来“击中”对象的“困惑与软弱”“戒心与隐蔽”。以入党

①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8—199页。

②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③ 冀南区的干部后来被集中到太行区偏城县（今河北省涉县偏城镇）开展整风。这超出了本文论题之范围。参见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冀南革命斗争史（192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页。

④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9页。

⑤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总结报告》（1943年9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晋档，A01/03/001/008。

⑥ 《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199页。

⑦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总结报告》（1943年9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晋档，A01/03/001/008。

动机为例,94名干部在入学前填写的表格中写“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有80人,写“抗日”的5人,写“对旧社会不满、找出路”的2人,写“想发家”的5人,写“对民主怀疑”的2人。但在整风的压力之下,有干部反省自己在此问题上没说实话,而“是乔装的”。反省结束后,根据干部们自己的交代情况,入党动机一栏的填写状况变化巨大:写“为分地、挣钱、求个人进步”的16人,写“要出去求生活”的42人,写“为名誉地位、投机、报复、虚荣好奇、求害人”的36人。照此交代结果,这近百名中层干部,可以说全都“入党动机不纯”。^①

尽管太行根据地的领导们后来并不太认可此次整风,但在1943年9月24日的总结中,还是大谈此期整风班的成绩和经验,他们认为:“(这次整风)挽救了一批干部、警觉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大批干部,……这是党的一个胜利,也是每一个同志的胜利!”而在这份总结报告的结尾处,某位领导人非常潦草地写下了对今后整风班几条零散的计划或是期许:“把自己做一个结论,来一个坦白运动;根据九条方针做一个标准;整风造成个运动。”而在他看来,实现之方式应当是“人人负责,欢迎积极分子,从下到上”。^②

三、审干压倒整风:党校第二期整风班

1943年10月6日,太行分局撤销,整风工作由太行区党委具体承接,新的整委会也随之成立。该委员会包括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张磐石、徐子荣^③、刘建勋^④、王树声^⑤、程式兰^⑥等9名成员。此外,太行分局党校改称太行区党校,在冷楚、贾久民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增补刘建勋为校党委常委。仅4天后^⑦,党校迎来了新一批参加整风的干部。这批干部共125人,其中军事干部29人(团级14人、营教导员及军分区科级干部11人,地方独立营营级干部4人)、地方干部96人,其中县委书记11人、县长5人、地区公安处处长2人、县委班子成员12人、县公安局局长9人,其余的57人来自行政系统和太行区党委直属机关。^⑧

此时日军已停止大规模“扫荡”,平汉线沿线形势恢复到了1940年之前的状况,太行根据地逐渐渡过难关,并扩大到豫北一带。^⑨当这些干部来到坐落于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太行区党委党校时,对随后的三个月里将经历怎样的身心考验尚无思想准备,大家甚至还有些初到边区首府的兴奋。^⑩

此刻,区党委和党校领导人心中却是另一番境况。这期整风班举办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

①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总结报告》(1943年9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08。

② 《晋冀豫区党委整风总结报告》(1943年9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1/008。

③ 时任太行五地委书记,之前曾长期担任根据地领导人。徐子荣的传记材料称因徐子荣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故将他调任五地委书记。参见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④ 时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参见《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00页。

⑤ 时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后调延安参加整风。参见温瑞茂、王森生主编《王树声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58页。

⑥ 时任太行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参见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1924—1949.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

⑦ 李雪峰在回忆录中提及此期整风班开始于10月24日,此处日期根据档案确定。参见《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总结》(1944年1月)。

⑧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总结》(1944年1月);最初称此整风班为第一期,但随后将前一阶段的党校整风也纳入到总结归纳范围内时改称“党校第二期整风班”。

⑨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92页。

⑩ 《太行整风整党记录本》(1943—1944)。

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人判断敌我斗争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虽明确反对“逼供信”,但基调仍为号召在整风过程中开展大规模审查干部、清查特务的工作。^①李雪峰等人在9月看到了此文件及其他有关反特务斗争方面的指示后^②,极大改变了对整风运动的定位与认识。他们觉得前期整风最大的缺点即是“未清查出内奸分子”,太行区党委根据所谓延安及西北局特务、特嫌“占整风干部10%”的经验,断定“我处不能没有”。对于“前期整风只发现几个可疑分子,并未抓住线索钻研下去”,太行区党委明显感到非常遗憾,但他们在此期党校整风班开学前,即已有了将“整风与审干结合进行的概念”。当然,对这些领导人而言,突出审干之环节,并不妨碍他们准备以自下而上之“思想运动”达成目标。^③

与前一期整风班不同,报到不久,这125名干部即被要求填写个人历史自传作为此后整风审干时的基本材料。为了积累思想问题素材,并逐步营造整风氛围,整委会的领导人们在“运动之准备阶段”便显得四平八稳^④,除了在“整风态度上和研究文件的方法上指导”之外,一直努力避免批评、刺激学员们,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随后开始18天整顿学风。区党委的本意是“发展理性、引导冷静考虑问题”^⑤,但如前所述,整风班的领导者们在行动上虽然以引导为主,但实际目标已发生偏离,审干压倒整风,关注搜寻疑点。仅小组讨论过程中,女干部冉×已被发现“复兴社关系的粗略”,及“整风态度的不老实”“刘少白的长期不满和离心思想”“刘子坚的情绪苦闷”等诸多问题。根据这些干部的表现,再加上阅读了这些人的自传,整风领导者已“估计他们几个可能有问题”。为进一步搜集材料,在整风间隙,整风领导者暗中布置所谓“辅导同志”及小组中的“积极可靠分子”经常以随便闲谈方式,接近这些受怀疑的干部,记录他们平时无意流露的“关系和材料”。^⑥

学风整顿完,党校组织干部们学习有关享乐主义问题的文件,而享乐主义问题讨论成为“由整风而审干”的关键一步。亲身参加过太行党校整风班的阮章竞(笔名洪荒)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当整风渐渐深入到男女关系问题时,便会突破人心灵的关键一道防线,而连带出其他各种问题。“工作过失、思想转化、党内斗争、阶级自觉、历史自觉等整风内容都进入了对自己的隐私的揭露”。^⑦

在根据地领导人眼里也是如此:

第一段,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从典型发言开始即开展了大胆之自我批评“群众运动阶段”,两天即形成运动,因之改变了原来党风学习计划,从揭发个人享乐主义起必然联系到组织问题,特别揭发了如何不满党、欺骗党、反对党,如部队公安部门内幕之揭发。^⑧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整风班的领导人依然坚持鼓励干部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干部间思想上的交锋是激烈的,绝非仅仅指向私生活之类的问题。区党委在1944年1月的总结中指出了当时批判与斗争的两方面要点: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6页。

^② 参见《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③ 《区党委党校第二次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1月),《党的建设》,第359页。

^④ 《区党委党校第二次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1月),《党的建设》,第359页。

^⑤ 《区党委党校第二次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1月),《党的建设》,第360页。

^⑥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⑦ 阮章竞著,方铭执笔:《太行山上》,未刊稿。

^⑧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1) 对不信任不服从党之偏向即服从真理服从组织后,对革命负责对党负责问题,反对人不反对组织等;(2)党内关系问题,也即个人在党内位置问题,提出认识关系问题自由主义感情问题、黑暗问题。^①

这时的思想论争并非事后“建构”出来的,干部们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会因理论问题争抢发言机会,辩论得面红耳赤。^②通过这一过程,区党委领导人判断干部们思想上的“主要危险倾向在于对党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其根源在于不了解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最高组织形式,不了解党对革命之领导作用,不了解为什么必须列宁型的党,因之无法了解列宁建党原则”。但要在如此“大鸣大放讨论”的众声喧嚣中疏通干部的思想,令来源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的干部们从心底里服膺党义,并非易事。经过一段讨论后,“有的同志尚在会后表示不服气”。区党委领导人在表示“惜此运动之发展未曾开展下去”之外,将此症结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情面主义毒害”,认为“和平建党是不可能的”,最终必须诉诸“党内斗争”。^③

恰在此时,整风班中有两名干部率先“坦白”,成为“坦白模范”。他们此前均被认为存在“敌特、国特”嫌疑,在压力下很快向组织坦白了自己所谓的“黑暗历史”。依据延安整风经验,整风班负责人马上安排他们组成“模范通讯分队”到处宣讲,鼓励其他人“自动向党坦白”。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很多干部也纷纷效法,“自我坦白”并相互揭发。女干部梁×在小组讨论过程中“自我揭发了过去的自首行为”,杨×“承认自己参加过阎锡山组织的同志会”,李××(某县县委书记)也说出自己曾“失足于敌”的问题,而王×则被别人揭发出“是被敌人派遣来的”。^④

整风班负责人随即宣布进入“党风学习”阶段。此阶段初期,整风班力图以大会、小会的思想运动方式,让有“特务嫌疑”的一批干部“袒露自我”。由于整风班里前期已涌现出一批率先“坦白”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开始进一步帮助他们学会“从大堆的历史材料及反省材料中找寻思想症结及政治历史问题的环节”。在“积极分子”早有准备的前提下,“问题干部”在党风大会上被不断地质问、批驳。而“积极分子”的出现,让旁观者也感受到形势的趋向,往往跟风发言,这就形成了更为强大的舆论压力。几位“问题干部”也被允许适当发言,“积极分子”被要求耐心听、耐心记,“从假材料里找真矛盾”。这类大会基本都由区党委领导人主持,每次大会结束后会对整风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作一讲话,对后续发展做出估计,并对“思想发展”和“运动方向”进行指导,实现“舆论酝酿”。会后,几位“问题干部”还须接受小组内的“批评与鼓励”。^⑤而这种小组会,有时会出现打骂现象。^⑥经过9天的党风大会、小组会,这几个干部身心俱疲。

这时区党委领导人宣布暂时休会,安排大家阅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及《中央反特务斗争指示》,作为新一轮运动的酝酿期。但“问题干部”并未得到喘息机会。整风班负责人首先动员了一批整风骨干和核心分子,分组对“问题干部”实施“突击”,要求他们坦白。由于组织上认为他们依旧“硬顶无赖”,决定对其采取“以硬对硬的严厉态度、以软对软的政治动员”。“硬”,不难理解,即是“逼供信”那一套办法;而“软”则比较丰富,即安排其他干部(包括与之熟悉的领导、同事)与他们亲近,劝其

① 《区党委党校第二次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1月),《党的建设》,第359页。

② 《太行整风整党记录本》(1943—1944)。

③ 《区党委党校第二次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年1月),《党的建设》,第361页。

④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⑤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⑥ 佚名:《孔祥桢传略》,未刊稿。

尽快坦白,有时甚至在他们面前痛哭流涕、跪求“坦白”。^① 这时,“积极分子”们的办法几乎已穷尽了,但多数“问题干部”却依旧没承认。他们企图一下搞到底,便没日没夜地继续“突击”。这种僵持状态终将个别人的精神压垮,出现“问题干部”杨×^②在“图逃未遂”后寻短见的突发事件。^③

此事件给整风班的干部们带来极大震动,一些干部要求召开批判大会,继续声讨已故的杨×。^④ 区党委领导人则意识到继续加压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⑤ 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干部群众介绍事件前后经过,一方面给此事件定了性。令人意外的是,区党委将杨×的故去定性为“被法西斯迫害致死”。^⑥ 这一定性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作为法西斯的敌对杨×过去的诱拐给他造成精神戕害,而这是他寻短见的关键。随后,区党委专门为杨×开了追悼大会。在会上,李雪峰和冷楚均“洒泪挽悼”,并向干部们解释了“党的宽大政策”,很多干部“留下了热泪”。同时,为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追悼会当天,党校成立了“校纪队”,公布了校规纪律,“只准集体行动,不准个人行动,不准与外界有任何往来”。^⑦

与追悼会相对照,整风班在第二天又召开“坦白大会”,让此前一直无法“突破”的李××(某县委书记)在大会上作公开“坦白”。区党委的报告如此记述当时的场景:

李××的坦白发言,比较坦白、率直,说了他失足的经过,及脱掉魔爪不得的痛苦恐惧与矛盾,为何在敌人威胁之下,将分委武林同志等名单忍心的当作对敌人的献礼,后武林被捕□□又英勇的牺牲,如何安排死后将自己东西财物交作党费,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气节形成对照。当场举行了惋惜失足者,追悼武林英勇牺牲的气节。在许多人的热泪滂沱中自然唱起了国际歌。有人痛哭着报名要求坦白。^⑧

李××的坦白得到整风班负责人的高度赞赏。^⑨ 这一正一奇的处理方式,再加上李雪峰等人对政策的解说,使得相当一部分尚未“坦白”的干部心理负担小了很多,因为看起来只要敢于揭露自我,似乎终能得到组织的包容。

应该说,突发事件的发生虽令整风的领导者们更加注意防范过激事件发生,但仍未改变他们在整风中以思想运动方式推动审干、实现寻出问题干部的目标,甚至还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整风班紧接着又连开三日“坦白大会”,多数“失足者”反复登台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被认为大部分已基本过关。之后,整风班主要是以小组的方式集中力量“突破”剩下的一些干部,而以大会来巩固那些被“突破”的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整风持何种立场,既往研究对整风、审干实际运作过程中的难度认识不够。在笔者看来,因为太行整风始终坚持干部的种种问题终须“通过思想解决”,也就是说施加种

①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② 杨×,原籍广东,抗战后到延安,在延安曾接受中央社会部训练,后被分配到太行根据地,先在二地委公安处任科员,后调任某县公安局局长。参见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③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④ 参见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⑤ 他们此时想到的负面影响是:“奸细分子可能乘机反攻,中间分子可能恐慌,积极分子可能胆怯,被孤立。”参见《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⑥ 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⑦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⑧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⑨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种外部压力最终还是必须促成干部主动承认与革除自身的历史问题、思想偏误,所以一系列思想动员绝非只是党组织自上而下给予判别与惩戒时的辅助手段。但是,当领导者主观地认定潜藏大量嫌疑者且需要通过思想斗争一一找出他们来的时候,整风和审干在实践层面即面临严重的困难,原计划的思想解决遭遇“抵抗”后,便常常演化为靠组织力量运筹、运动氛围施压、积极分子强逼等方式迫使干部最终作出一个难辨真假的上纲上线的表态。这样的“思想解决”显然不是区党委领导人和整风班领导者们想要的。

具体说来,当多数干部“坦白”之后,仍有部分干部坚持不肯“坦白”,这令整风的领导者们颇伤脑筋。比如,有一个干部一直顶了一个月才被突破,耗费整风班领导人和那些整风骨干大量时间、精力,这令他们觉得是“两条心干部调动了我们,缠住了我们的力量,拖延放弃了其他人的整风,放过了隐在背后的克服半条心”。而剩下的这些对象往往是一些性格坚毅、社会经验丰富的干部。在区党委看来,这些人“硬顶软磨,滑来滑去,转圈子,臆造规律事实,玩弄概念,用无关的事实掩藏真实的问题环节,总之是为了拖时间”。^①这种情形与一位老干部的回忆相吻合:

我之前讲的真的问题,他们倒是不信,开始讲故事,如交过日本军官好朋友,赌钱输了把枪当了,反正瞎胡吹了一谷堆,我可能也不机敏了,可就是不承认是特务,听的人愿意听,但第二天让领导一看,人家不信,还得继续整。最后拖到没办法,就算了个嫌疑分子。^②

同时,有已“坦白”的干部推翻原来承认的材料,出现反复翻供现象。这给负责审查他们的干部带来极大的困难,一些小组负责人甚至因此丧失了信心,出现了所谓“困倦”问题。这同样令整风领导者们想不出解决办法。比如,1943年12月28日,被认为“反复狡赖四五次”的干部王×在大会上又“当场翻案三次”。这种情况令领导们也无可奈何,只能认定为“超出整风范围以外的态度”,放弃“思想解决”。随后整风班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停止王×党籍,交送保卫部门处理。^③

整风班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反思自身在整风方法和指导方面的缺点,觉得“有些过分伤害了坦白分子自尊心、个别小组亦有言谈中不注意刺激了情绪的,或者方式过于激烈,发现指颜唾面、推搡辱骂等情形”。而且,至1944年1月中旬,整风班结束时间已到,按期报到的新一期整风班学员来了连床铺都没有,这使得此期整风班必须赶紧结束。大多尚未详细审查的所谓“挂号分子”最终被“放回工作岗位”,但已经“开始突破的、重要的”6个问题干部,以及一批“整风骨干”则被留下来组成了一个整风小班。这6个干部最终全都被“突破”了,但其中一个干部因“逼供信”“讲出了大批材料,牵涉很广”,甚至将第三期党校整风班的学员们也大面积牵涉进来,在干部中间也引起了很大震动,整风领导也“于短时间失去理智的权衡”。以致于出现了李雪峰在回忆中提到的“有人指供边区有一个庞大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其领导人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有人说区党委机关内有特务,甚至说我家妻子翟英也是特务”等状况。这无疑给李雪峰等人带来个大难题,最后在召开区党委会专门研究讨论后,决定将这些耸人听闻的材料弃置一旁。^④即便如此,此期整风班共审查出“内奸(特务)分子”19人,“嫌疑分子”15人。^⑤

①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② 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峰同志访问记录》(1992年9月11日)。

③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④ 李雪峰在回忆录中提到在讨论此事时区党委内部有委员认为应继续发动群众,不能束缚手脚,此人可能是冷楚。因为在下一期整风班中,李雪峰开始亲自直接领导整风工作,而党校负责人冷楚则一度出现较少。

⑤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四、高潮与落潮：党校第三期整风班

如前所述，在第二期整风班尚未结束时，奉调参加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班的干部们已陆续来到太行党校驻地涉县赤岸村。因此，在对第二期整风班仓促收尾后，太行区党委紧锣密鼓地举办了党校第三期整风班。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班是区一级整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期，也被北方局、区党委视为最成功的一期。

这期整风班的学员背景比上期更加丰富。1944年1月时学员共168人，其中地委委员、军分区领导16人，县团级干部68人，区党委、地委直属机关处（科）级干部68人，其余还有一些分区书记、营长等比较重要的中低级干部。在李雪峰的回忆录中，提及此期整风班“有2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两个数字差距为何这么大？这应该是因为区党委还调入其他一些干部参加到整风班中。目前可知的是，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上一期留下来的部分积极分子，具体数量不详；一部分为“重要嫌疑分子”，具体数量不详；还有一部分则为专门安排进整风班的“保卫干部和锄奸干部”共20人。^①

开学之初，首先用一周的时间学习“四三决定”^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目的是端正整风学习的态度，“促使干部安心整风”。这一周里看似平静，实际上却已是暗流涌动。此时，整风班领导者们的思想基本延续了第二期“视整风为审干手段”的观点。整风班安排的负责整风辅导的干部也基本是第二期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警惕性”更高，甚至持整风班是“单纯审干”的观点，再加上前述那20名特殊的学员的存在，所以“干部一入校就布置了侦查，收集材料，在自传中收集可疑环节”。^③

如此心态下，整风班进入整顿学风阶段时，很快便出现问题。学风阶段原本应“个人谈文件，联系反省自己，初步认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思想上的毛病”。^④但整风班对干部们采取“严加管理”的办法，要求“行动必须集体”，这令不少干部感到“惶恐”，紧张的空气让一些干部甚至已开始“等着挨整”。这样一来，在反省时他们大多“谨小慎微、不致表现”。眼见反省效果不佳，整风班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便又想“突击”部分对象。此时连反省尚未深入，突击对象自然实在是难以确定。他们便根据登记材料直接划定“涉嫌人员”，但他们的划分标准明显是“过敏”且“缺乏科学精神”的。比如，一个干部的祖父曾是同盟会会员，便被当作有国民党关系，以“特嫌”对待。于是，此期整风班在开始阶段“逼供信”问题一度加剧。恰在此时，上期留下的小班中，一位干部“供出这一期已有特务支部的组织，并供出许多人，特务转来关系的情形即接头方法”。同时，在整风班领导人整顿学风阶段的最后10天里，接连召开了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造成大面积的“乱供”。一时间，整风班中“特嫌”达到60%以上^⑤，几乎要成了“特务满天飞”。

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区党委“认为这样的组织绝无可能，考虑到特务是秘密的，绝不是这样庞大，也不会随便就乱打通关系，而且所供的人员，都是若干年经过斗争考验及党内生活考验过

① 《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经验》（1944年6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18/005。

② 即《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因发布时间为1943年4月3日而得名，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第28—33页。

③ 《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经验》（1944年6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18/005。

④ 《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经验》（1944年6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18/005。

⑤ 《整风审干的几点检讨》（1944年），具体日期不详。

的”，他们“觉得需要冷静”。^①不过，他们并非真的认为整风班中没有特务。^②但总体上看，李雪峰等人还是保持了相对清醒的状态。区党委先是指示党校将整风“稍稍冷一下”，随后专门召开会议，对整风班提出几点要求：一是要提高整风比重；二是要保持自由意志；三是要以同志的态度对人。^③这样一来，前期抛开整风大范围开展审干、抢救、反特的趋势总算得到遏止。

在1944年2月中旬之后，第三期整风班进入了党风整顿阶段。因认为前一段时间仍存在“自上而下、外部过多”偏向，这一阶段，区党委和整风班的领导人力提倡民主。他们首先安排选举整风班主席团，由学员自行选举整风班自己的领导集体，再由主席团自主安排整风活动，李雪峰等区党委领导人也亲自参加整风，到各个小组中和学员们一起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民主的氛围里，干部们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发言异常踊跃，争论也日渐激烈。不过，前一阶段偏离正轨的整风令不少学员积累了不满情绪，此时一旦畅所欲言，不由得言辞激烈。比如党委研究室的老资格干部任瑞廷发言说：“党内是民主的，我在革命队伍里不是小伙子，革命队伍里也不应该有大掌柜”，他觉得“离开真理去讲铁的纪律不利于党内民主。什么都讲绝对服从，党员还敢说什么？”任瑞廷的锋芒直指抗战初的太岳特委书记，认为其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生活作风等方面均有错误，他甚至要求区党委审查此领导人。^④

任的发言充分体现了此阶段整风中一度出现的大气候。他的发言刚一结束，“会场便顿时轰动了”。但在强调“自由意志”，发扬民主的党风整顿阶段，李雪峰虽将任瑞廷划为思想上需要突破的“堡垒”，却并未当即对任瑞廷采取打压措施，只是在总结时以调侃的方式提示任的发言本身站不住脚。^⑤

紧接着发言的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建勋和组织部另一干部均对任瑞廷予以批评。刘建勋认为任瑞廷违背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原则——“党要有铁的纪律，即使是组织错了，也应该服从！不然，革命不可能成功”。但随后发言的武乡县委书记李友九又与任瑞廷的想法类似，他表示“在党内只佩服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主张“只服从真理，凡事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反对盲从，反对奴隶主义”。^⑥

任瑞廷的回忆可能未尽准确，但从当时形成的材料来看，他的描述与当时整风班的氛围是一致的。区党委认为，“党风大讨论”成了“单纯暴露、挖掘”。比如有的干部认为“党妨害了自己，革命耽误了自己的青春，自己有功，党不提拔”；有些年纪大的女同志“埋怨党不给自己找老翁”；有的干部觉得“党内不公平、循资顾私”；也有部分干部批评“党官僚化了”“过分服从党的同志是奴隶性”“党内斗争和旧社会互相倾轧一样”。另外一些干部虽自我反省却因集中于享乐主义之类私生活问题，组织者也怕“破坏民主”而未予引导，使得干部们陷入某种程度的低级趣味之中，说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津津有味，这令部分干部觉得“自己过去太老实了，没有也腐化一番”。^⑦

这些话大多属于牢骚，但积累起来使得整风班一度又失去焦点，因为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这时候好像变成“普遍不满意”状态。其实，在太行山涧里战斗、生活了六七年的干部们，普遍遭遇过政治上、生活上的不如意，在革命历程中多少积存了些对领导的不满。特别是百团大战后各根据地因日军反复扫荡等原因而不能像抗战初期那样获得较快发

①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② 赵指军：《红军战士于一川》，非正式出版物，2005年，第197—198页。

③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④ 任瑞廷口述，李丽君编著：《回顾与思考：任瑞廷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

⑤ 任瑞廷口述，李丽君编著：《回顾与思考：任瑞廷回忆录》，第63—64页。

⑥ 任瑞廷口述，李丽君编著：《回顾与思考：任瑞廷回忆录》，第63—64页。

⑦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展,甚至相当一部分根据地的区域、人口均呈收缩状态。在这样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停滞期”,干部们获得晋升、重用的机会大大减少,反而因缩编、精简还有可能被降职,这令很多脱离家庭,视政治生命为精神支柱的干部们,产生了较多不安和腹诽。^①而每个人总是批评易、反省难,在整风班中遭遇压抑的干部们此时得到了“发泄的畅快感”,自然容易忘记来这里的“本分”,“几乎有不顾继续整风之势”。区党委看到大量干部的批评意见都是“对着领导、对着党,而不是自己”,“是从延安骂到太行山”,不由得再次焦虑起来。他们认为本是学习延安整风中的经验,可现实是整风几乎难以继了。在讨论之后,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邪气大为抬头、党性窒息”,而原因则被归结为“两条心分子乘机破坏整风”。^②

会后,整风班的领导者们仍决心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改变整风走向。他们立即召开了三个会:群众大会、积极分子大会和检查领导大会。他们动员积极分子,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先出来继续提些意见,区党委做些检讨,但在检讨获得“提意见者满意”后,开始对前期干部们的错误思想展开回击和批评。为此,他们提出一个核心命题:革命为了谁?党为谁?这个论题是极具针对性的,直指干部们的内心脆弱处。每个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如果扪心自问,都会至少在抽象意义上认可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革命者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在立场上要与无产阶级保持一致,理应是为人民大众而革命,绝非为自己。那么,联系自己的实际,谁内心之中又不多少存有私念呢?想到此处,这200多名干部恐怕没有几人会觉得自己不存在内心上的丝毫不安。

为了实现整风“人人过关、打通思想”的最终目标,区党委和第三期整风班领导人决心首先“调动老干部”,针对他们对革命的厌倦情绪和复杂的革命阅历,首先实施整顿。尽管这些老干部,特别是一些出身工农的老干部在“历史自觉”“阶级自觉”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一连串质问、逼问,但整风领导者们还是首先肯定他们的功绩,促使他们“在思想矛盾、小受痛苦之后从大处算计”,让他们首先过关。在李雪峰等人看来,这种办法同样是对之前“从外部纠正”思路的调整。^③

这些先期“过关”的干部很多转化为积极分子,在大会、小会上开始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大张挞伐。起初,还有一些干部起来辩驳,但终究无法抵挡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段时间里,整风班领导人安排积极分子们一个组一个组地进行“辅导”,在组内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思想斗争,同时,每日安排一个已经实现“革命自觉”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校内巡回讲演。除此之外,还每天出墙报通报干部的自觉情况,并提出各种问题。例如:“是一家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呢?还是要有个规矩、有个领导?”“是党离不开我,还是我离不开党呢?”“有没有‘心肝对党’?”伴随着这些日常的思想整顿,第三期整风班还组织了多次思想坦白大会。一些老干部在会上登台发言,自我批评的同时用大量时间回忆过去的艰苦奋斗、“与党共患难的情形”,对自己思想的动摇表示“倍加愧悔”。台上台下很多干部都洒下热泪。面对这样的情势,白天多少遭到抑制的思虑和畏惧还在梦中有所体现,据记载“多人痛苦,晚睡说梦话”。^④

确实,自1937年夏天以来六七年的艰苦奋斗,太行根据地的干部形成了大量的共同记忆,这种革命史的追忆往往最能令干部们产生共情。这一方面是希望在抚今追昔中凝聚人心,创造整风中的反省气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确立一条纵贯太行根据地创建、发展历史的正确路线,巩固区党委领导权威。

整风班的领导人并未就此罢了,而是继续组织广大老干部、包括白区老干部、“正派知识分子

^① 参见佚名《反省两年来的错误》;佚名:《从思想意识上认识自己》;佚名:《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这三篇文稿均为北方局辑录的整风中地、县级干部撰写的思想反省笔记。

^②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③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④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干部”向党坦白,开展新的自我批评运动,连续召开六次大会。在内容上着重批评“反人民的主张”“分析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及天然缺陷”。此时,整风班可以说是进入高潮阶段,区党委也认为“这是整风以来最丰富、最生动、最激烈的阶段”。^①

不过,此时的整风班里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论,那些错误思想主要是坦白者自己提出来供大家批评的。对整风领导者而言,这六次坦白大会的意义在于大批干部开始在大会上“坦白党派问题了”。有人“说参加过复兴社、CC”,有人“说抗战后,他到西安入军校,不久参加了复兴社”,有人“反省说他在牺盟会工作时缴了八路军一条枪”。而最后一个上去发言的干部在反省自己如何对不住党时失声痛哭,引起全场痛哭。这引起了整风班负责人的关注,因为他们原计划准备在坦白运动形成高潮之际,“趁热打铁,深入审干推动坦白”。但李雪峰等人在这个时候汲取了前一阶段的教训,认为再追下去可能形成“逼或突”的危险,便将坦白运动坚决停止了,而转入新一轮的常规整风学习。李雪峰提出:“要从感情上鼓动,不乘人之危,对运动的转折,宁失之过早,不失之过迟。”^②随后,整风班里组织了一次娱乐晚会,整风形势自此渐趋平和。

不过,一个新问题在这时候出现了。大部分积极分子对于这次运动突然“转弯”很不满意,表面上看来,他们是不相信那些问题干部都坦白了,认为不该停止而应追下去,认为区党委是泼了冷水,不利于整风。实际上,这些积极分子往往怀有自己的小心思。这些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先挨了“整”的,尽管未遭遇太多“逼供信”也是多少受了些苦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此时停止会让大批干部逃过“心劫”、逃过皮肉之苦,而“自己已整好了,只是陪伴人家了”,他们不由得心里不平衡起来,从而产生负面情绪。^③

那是不是说此期整风真的放松了审干工作呢?笔者觉得并非如此。第二期整风班,受到延安整风、北方局党校整风班思路的影响,将审干也“群众运动化”。但在此期整风班一度出现“特务满天飞”的严重偏差后,李雪峰等人对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思索。同时,太行整风的调整也与中共中央的干预有关。1944年春夏之交,延安整风运动已逐渐落潮,进入所谓甄别阶段,毛泽东也曾在不同场合向干部们脱帽致歉。^④1944年5月12日,区党委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作了明确的检讨:

对整风的伟大意义认识不够,没有把整风当成独立的阶段。虽然整风与审干有联系,但我们不了解整风的意义,处处为审干着想。把整风当附属的,产生了重审干轻整风的思想。实质是把整风当成审干的手段。^⑤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领导人将审干重新“秘密化”了,只是在领导集团中进行审干酝酿,然后安排专业干部开展审干。他们自己也承认:“对于所有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思想言论,都不当作干部思想来研究,一概认为是特务对我斗争的策略。”例如,对于前面大会上坦白的自称“参加过复兴社、CC系”的干部,领导者们即认为:“就其坦白的环节看来,绝不止是党派问题。”^⑥

① 《区党委党校党风学习五月份的发展情况》(1944年5月28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8。

②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③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

⑤ 《整风审干经验教训总结》(1944年5月12日)。从笔迹看此总结出自李雪峰之手,文中屡屡提及“中央”如何如何,故笔者判断这是随后要提交中央的总结草稿。

⑥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正因为如此,在党校中形成了“冰火两重”的状况。一方面,部分干部依旧遭遇严厉整顿。1944年底1945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区党委领导人又先后作了“反骄气”“反思想斗争的软骨病”等多次内部报告,算是给积极分子撑腰、提气,^①小组内的斗争又频繁、紧张起来,又查出一批所谓的“特务”。区党委见“左”的形势又发展起来,连忙再次召开会议,叫停各类思想斗争。^②另一方面,自1944年夏秋起,对那些过关和基本过关的干部天天除了自己读点文件就是吃饭、睡觉。^③这令部分干部觉得整风到后来已没有多少生气,逐渐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认为大整风变成了“大厌风”。^④当然,回头来看,对于很多干部而言,相对闲暇时自己读书、看文件,整风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实际上往往效果不错。^⑤

总的来说,第三期整风班在后期逐渐回归到思想整顿上来,开始努力以正面教育为主,号召干部们“发扬正气、英雄气概”,辅之以学习文件、理论书籍等常规学习课程。与此同时,审干也进入材料整理、订正阶段。这时整风班里一部分因坦白而被扣上各种帽子的干部频频“翻供”,令区党委和整风班领导人们均感棘手。这是整风在进入收束期以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整风中遭遇“历史不清”嫌疑的原太行一地委书记郭峰在日记中写道:

众多所谓的“坦白分子”纷纷提出平反要求,一时难以解决。只好宣布整风审干结束,遗留问题回原单位解决。^⑥

诚如郭峰所言,太行区党委因无心也无力进行甄别工作,最后使这一波“翻供潮”“请命潮”成为此期整风结束的直接缘由。不过,第三期整风班虽被李雪峰认为纠正了上一期过“左”的偏差,就一般过程看也注意克服了运动型审干的弊端,但从整风审干之后形成的问题干部数量来看,则有些“反常识”之感。在1944年6月时,区党委认为有40%左右的学员是特务、特嫌之类的坏干部。而到了1945年4月第三期整风班结束时虽有部分干部获得“释嫌”处理,但审查出“问题干部”仍高达56人^⑦,除去前文所说的刻意调入的积极分子和保卫干部,“问题干部”比例更是远高于前一期整风班。

五、余论

自1943年温村会议之后,太行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并与审干紧密结合。在太行整风过程中,绝大多数地、县、区三级干部均参与其中,接受了组织上的严峻考验。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班结束后,太行根据地中上层干部的整风已大体结束,李雪峰、赖若愚等区党委领导人的精力此时已投向对日反攻作战、“查减运动”等方面。尽管太行区党委在1945年5月对两年整风、审干作一大致总结后,办了第四期整风班(1945年5月10日—1946年3月15日),却仅是由党校领

①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② 《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晋档,A01/03/003/001。

③ 《区党委第三期整风审干报告》(约形成于1944年底)。

④ 参见赵雨亭《生平纪实》,山西省新闻出版局2002年版,第15页。

⑤ 《温村整风班某干部日记》(1945年1月—2月)。

⑥ 《郭峰日记》,1944年9月25日,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永远的怀念:郭峰工作文集》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⑦ 《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审干结果》(1945年4月)。

导负责主持^①，几位民主推选出来的整风班支部委员负责配合开展，整风班规格已大大下降。此期整风班自然不是敷衍了事，但总体是依照第三期整风班中后期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趋于常规化而少有波澜。^②这与此前的整风其实在性质上已有所区别。

总的情况是，党校第一期整风班中，参加者200人（过半为冀南区干部），第二期整风班125人，第三期整风班168人（不包括上期留下的及刻意调入的保卫干部）。因此，三期整风班共493人。由于第一期尚未开展审干，故整风班结束时并未发现所谓的“特务分子”“特嫌分子”之类问题干部；第二期整风班共审查出“内奸（特务）分子”19人、“嫌疑分子”15人^③；第三期整风班对审干标准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共审查出“特务分子”8人、“特嫌分子”11人、“变节分子”3人，“党派问题干部”9人，“面貌不清分子”20人，“存疑分子”5人。^④累积起来，有“特务分子”27人、“特嫌分子”26人、存在其他各类问题的干部共37人，“问题干部”共计90人，大致占整风班学员总数的18.3%，若排除第一期整风班的200位干部，则比例高达31.8%。

除三期党校整风班外，区党委还举办了两期针对政权干部的索堡整风班和一期宣教系统的温村整风班。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整风班中均有一定比例的非党干部。

就索堡整风班来说，第一期规模很小，参加干部共47人（非党16人），虽不知具体有多少人被审出问题，但据后来总结说第一期“发生了‘左’的偏向”，可知比例应不会太低。第二期整风班共有干部219人（非党66人），共审查出“特务分子”10人，“特嫌”25人，“党派问题”6人，“变节分子”5人，存疑5人。同时，索堡整风班的还划分出另外两类“问题干部”，一是“弄不清”26人，二是“利用”^⑤7人。这样算起来，共计有84名干部被审查出问题，占总数的41.7%。^⑥此外，第二期索堡整风班中还有31名干部曾在整风过程中受到整风班领导者的怀疑，他们也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而与无问题干部相区别。

温村整风班集中了太行根据地的“文化人”及太行联合中学师生，规模比较大。受太行整风大气候影响，温村整风班在1944年初也出现审干失控的局面，仅太行联中即有176人被列为特务。^⑦但在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干预后，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根据温村整风班某干部的日记看，其中出现的仍被逼交代特务行径和关系的干部至少有12个。^⑧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干部”数量已是在初步甄别、平反之后的统计数字。所以，在整风班中遭遇“突破”或因“逼供信”而“坦白”的干部所占比例应远高于18.3%。一部分干部虽主动坦白，但党组织并非全部采信，如前文提及的在第二期整风班中很早“坦白”的女干部冉×，整风班领导即认为她说的并非事实，连“特嫌”都没算。^⑨除区党委党校的整风班外，各地委也在同期举办了整风班，广大中下层干部均是在所属地委参加整风运动。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掌握六个地委整风运动情况的所有材料。但截至1944年9月初之前，太行根据地三、四、五、六，4个地委县科级（地、县机关）和区级干部参加整风运动情况大致如下（见表1、表2）：

^① 冷楚在1944年7月后调任太行一地委书记，1945年8月后刘建勋调任太行三地委书记，此后的整风即主要由贾久民（刘建勋调走后接任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武振声（校党委常委、组织科科长）。

^② 贾久民：《太行党校第四期整风报告》（1946年7月），《党的建设》，第422—436页。

^③ 参见《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④ 《太行区党校第三期整风审干结果》（1945年4月）。

^⑤ 指曾被敌特利用的干部。

^⑥ 《索堡整风班第二期总结》（1945年7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49/003。

^⑦ 参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烽火太行摇篮情：太行联中纪念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⑧ 《温村整风班某干部日记》（1945年1月—2月）。

^⑨ 《审干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大约形成于1944年后半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9。

表1 三、四、五、六地委县科级干部参加整风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已整	在整	未整	共计
党务	32	50	17	99
政权	29	123	88	240
其他①	15	73	32	120
合计	76	246	137	459
比例(%)	16.5	53.5	29.8	

资料来源:《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表2 三、四、五、六地委区级干部参加整风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已整	在整	未整	共计
合计	72	191	1008	1271
比例(%)	5	15	79	

资料来源:《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由表1不难看出,已有将近70%的县级干部已参加整风,其中党务干部“已整”与“在整”者达80%。地方区级干部的整风此时尚未大规模开展,参加者多为地、县两级直属机关干部。

同时,这四个地委也对审干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见表3、表4):

表3 三、四、五、六地委科级干部审干结果统计表

单位:人

	骨干	一般	应清洗对象	特嫌分子	特务分子
党务	23	38		9	1
政权	16	47	1	64	5
区武委会	16	13	1	16	2
合计	55	98	2	89	8
比例(%)	22	39	0.7	35	3

资料来源:《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表4 三、四、五、六地委区级干部审干结果统计表

单位:人

	骨干	一般	应清洗对象	特嫌分子	特务分子
党务	54	44	1	26	
政权	18	30	19	68	4
区武委会	6	5	1	5	2
合计	78	79	21	99	6
比例(%)	28	28	7	35	2

资料来源:《区党委在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整风审干总结》(1944年9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03/001。

① 军分区的干部虽也在区党委党校整风,但他们是由八路军政治部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召集,不在此统计之列,这里“其他”主要包括群团干部及县级武装工作干部(武委会主任、独立营军政主官)。

就这两份审干结果统计来看,地委一级的整风审干在内部整肃方面比区党委严厉一些,明确提出“应该清洗”。区党委党校整风班中,第二期、第三期中均有个别干部被移交保卫部门审讯(目前可知的有太行新华书店副经理王×和以民主人士面貌出现的边区参议会议副议长刘××),但仍未被当作清洗对象。另外,政权系统干部仍然是遭到“重点整顿”的群体,根据这两个表格,科级“清洗对象”“特嫌分子”“特务分子”中政权干部占比分别达25%、71.9%、62.5%,区级干部中占比则分别达90.5%、68.7%、66.7%,合计起来,这四个地委中政权系统“问题干部”占“问题干部”总数的71.6%。与此相应,政权干部在整风中成为整风班骨干(积极分子)的则明显偏少(特别是在区级干部当中),党务干部则更受党组织信赖。这种情况的出现,自与太行根据地长期以来政权干部来源、成分更复杂等问题有关。^①

如前所述,1944年夏季之后,太行整风已逐渐落潮,但这是指整风运动的“群运性质”减弱,在激烈性减退的同时,相对隐秘的审干工作仍在积极进行当中,从二地委1945年的一期整风审干报告看,参与整风的43名干部,最终仍有31个人“坦白”,他们均被认定为“特务分子”“特嫌分子”或存在“党派问题”,占总人数的72.1%。^②

思想人心之“风”时聚时散、变化无常,“观风察势”已大不易,中国共产党人则是要“捕风”“移风”“整风”。从太行区党委整风之大体过程来看,党组织始终希望以整风对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寻求一种主动性的解决。这体现中国共产党巨大政治气魄,而壮举背后的艰辛自然也非同寻常。

我们可以看到,整风的领导者一直努力坚持以自下而上的思想动员和思想斗争为主要整顿方式,尽管结合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却绝非以所谓的“整人”为目标。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地领导人曾力图通过发扬民主来暴露问题、解决问题。不过,这种“民主”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将群众运动引入党内”的倾向。这无疑给太行整风带来严重困扰。因求得主动性的思想解决本身存在极大难度,这与运动式治理谋求短期集中“突破”的思路存在矛盾。同时,组织压力又造成严重政治紧张感,在整风班中几度出现干部“乱坦白”“特务满天飞”的状况,使整风偏离原本的目标。根据地领导人面对运动与管控的两难处境,保持了总体上的冷静与理智,加之上级党组织的影响,李雪峰等人较好地平衡了整风运动中各种发展趋向,尽管审干、“整关系”“抢救”及“抓特务”使得太行整风有了各种其他大大小小的目标,产生了各种或好或坏的副产品,偏离了整顿“三风”的焦点,但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绊绊的波澜中实现软着陆,没有出现政治整肃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把干部们的注意力最终拉回到主旨上来,可谓“失焦而不失控”。

在此过程中太行区党委的整风运动在“法理”层面巩固了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权威,较好地理顺了干部群体内部关系。

延安整风是由中共中央直接并具体领导的。对参加整风的一般干部而言,中共中央负责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学习委员会具有高度权威。但太行区党委的整风运动作为一场地方性干部整顿活动,缺乏此天然位势差,干部们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根据地党组织积蓄的种种意见,常常会直接影响整风进程。对此,太行整风过程中,整风领导者在突出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思想动员、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一直注意具体的策略和方法。

在区党委与下级党组织、地方党与干部间关系问题上,他们常常有意采取模糊化的办法,绕开地方党与干部的关系问题不做结论;但在党与干部个体、民主与集中问题上则摆出进取姿态,集中火力批判干部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思想,以中央整风文件为依据,通过自我反

^① 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太行二地委审干情况报告》(1945年6月22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3/02/004/002。

省、自觉运动甚至是坦白运动,令干部在抽象层面形成对党的愧疚感,进而建立作为概念集合体的“党”与干部个体之间的一种服从被服从关系。^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主动反求诸己又施以外部强力的状况下,干部们谁也难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毫无政治上的过失或德行上的失当。在此基础上,整风领导者们也效法中央对太行根据地党组织的历史进行总体回顾,将根据地发展史与党的总体史在关节处一一建立联系,以证明自身发展虽有曲折,但整体上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党中央在根据地的具体化,最终确立一条纵贯太行党史的正确路线,将党中央在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赋予了自己。

经过一个“置换”过程,党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权威终被授予太行区党委及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人,根据地党组织也分出了历史上的孰是孰非,进而构建出一种新的“党——根据地党组织——干部”关系。在整风运动之后,太行根据地内地方党组织在较大范围里对组织关系进行了整顿,这主要是效法区党委。1945年初即有地委书记表示回去以后要“整关系(县、区),政权部门也搞”。^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关系调整抑或说太行根据地党组织权威的强化主要体现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层面,干部在方向性问题上自搞一套、对上级党组织提出质疑的大为减少。^③但若认为整风后绝大多数干部在实践层面会做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就太行根据地而言,则有言过其实的嫌疑。1945年初,太行军区在根据地南线发动局部反攻,收复2000余平方公里国土。这些新区急需大量干部。但不少干部对到相对危险的南部边沿区、新开辟区工作充满畏惧。很多参加过整风的干部依旧不服从组织的“南调”安排。太行三地委书记王一伦即在1945年3月的组织联席会议上抱怨道:“调出是大问题,现干部愿往北区,不愿往南。榆社成熟干部一个也调不出,整风后反调不出。”^④

另外,受资料所限,我们难以对太行整风过程里中共中央与根据地党组织的具体互动作出深入考察,但还是能够看到,延安整风的时间差对太行整风的起承转合有直接影响。太行区党委在根据地内真正全力推动整风运动时,延安整风正值审干、“抢救”发生偏误的高潮期,受其影响,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稍作预热即“大兴审干”^⑤,以致出现“特务满天飞”的严重偏差。但太行整风的“酷热期”刚好赶上延安整风全面纠偏的“落潮期”,所以问题的延宕期比较短暂。大体而言,太行区党委的整风运动短时间内氛围浓烈、热度十足,对干部群体的思想、情感形成巨大震动,在短时间内审出一批“特务”“特嫌”等“问题干部”,但运动的降调、转弯也比较及时,未造成对干部队伍的过度冲击,整风的组织者、领导者保持着对运动的进程、走向的基本掌控。这体现着根据地领导人的政治素养、领导能力,也与领导集体的团结状况有关。

[作者赵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党校第三期整风经验》(1944年6月3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3/018/005。

② 《第六次组联会会议记录》(1945年2月),山西省档案馆藏,晋档,A01/02/008/001。

③ 对整风效果及整风后干部群体相关情况将另文探讨。

④ 《太行三地委工作汇报》(1945年3月)。

⑤ 《党校第一期整风审查干部材料》(约形成于1944年2月)。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1, 2019

Preamble *Gao Shihua*(4)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Zhang Yiming*(5)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foreign enemy's oppression, how to integrate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top design of the Kuomintang in wartim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est of war wa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puzzled Chiang Kai-shek.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37, and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1939, became Chiang Kai-shek's "answer" to such a difficult problem. In fact, since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was creat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Supreme Headquarters with wartime command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s successor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inherited only its predecessor's status as a wartime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 and did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ilitary command, and never got rid of the hassle of day-to-day administrative affairs. Chiang Kai-shek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his own think tank team and staff organization by setting up the secretarial office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nd reorganizing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s. The creation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objectively strengthened Chiang Kai-shek's individual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ner-Party Election Campaign: The Local Election of the Kuominta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Liang Xinlei*(17)

In 1924, after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ed itself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Russia,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required that the Party headquarters at all levels must be directly elected. Subseque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broke down, and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disturbed, resulting in the practice of electoral system to go through twists and vari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 had once explicitly suspended provincial and county elections. Although the election system had been reopened soon after, the electoral system had become a tool of factional struggles within the Party. Among the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Zhu Jiahua Clique and the CC Clique in the local party headquarters was the main line, and also mixed with struggles among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and local power groups. Under the cover of the inner-party democratic coat, all parties, in order to win the election, did not hesitate to overstep the system and arrange and manipulate the elections. In the e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failed to revitalize the Party affairs, but rather led to the complete openness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different factions in the Party, and the chaos of the local power order, resulting in the Kuomintang into a more precarious situation.

The Prosecutors in War Zon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Kuomintang Secret Service Personnel Engaged in Judicial Works *Li Zaiquan*(37)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in Taihang Distric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42—1945 *Zhao Nuo*(52)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aihang base area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one in various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North China.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 Taihang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itially presented a state of "delaying;" under the direct push of the higher-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Taihang base area eventually spread

out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base area in an all-round way. Among them, the four times of Rectification classes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Taihang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especially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time, were the key to the Taihang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leaders of the base area mainly adopted the movement-style inner-party governance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bottom-up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but also combined with the top-down organizational means. During the period,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errors in cadre-examination, and it was not going well to finish the Movement, the leaders in general remained calm and rational, which could be said to be “out of focus but not out of control.”

Study, Cadre-Examination and Democratic Inspectio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the CPC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Guo Ning* (72)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began in 1942 and ended in 1945, including study and cadre-exam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the democratic inspection reached a climax, and due to Luo Ronghuan's restraint, it did not develop into a large-scal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Rectification and cadre-examination, in essence, was a purity campaign organized by the CPC,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coopera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fied leadership in Shandong. Through the Rectification, Mao Zedong established his position of undisputed leader in the CPC, and Mao Zedong Thought becam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whole Party. During Shandong's Rectification Movement, Mao Zedong'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whole Party was highlighted, and Luo Ronghuan'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handong was also strengthened. It consolid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unified leadership in Shandong, and ensure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Yan'an over Shandong.

“An Expedient Measure:” The Re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Voluntary Group *Xu Liang* (93)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Unit (A) 1855 of Japanese North China Dispatch Army *Zhao Yan* (108)

Unit (A) 1855 of Japanese North China Dispatch Army (also called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quadron Unit 1855) was a unit for bacteriological studie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secretly built by Japanese aggressive army in North China. The continuing studie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since the 1950s have given us a considera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rimes of the unit, but there are still divergent opinions on details such as the date, location of its compilation, the process of its building and establishment system, etc.,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not very clea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mbining with the existing and other newly fou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has made clear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evolution, time of compilation and leaders of North China Area Army's Unit of Temporary Fiel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No. 1 Unit of Field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Temporary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Temporar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from July 1937 to March 1940, and confirms that Unit of North China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Unit, e.g. Unit 1855,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the Kwantung Army's Uni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it lasted for nearly three years.

A Study of Claims for Indemnity of the Privately-owned Steamship Industry in Shangha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fter World War II, 1945 – 1948 *Ma Zhenbo* (130)

How to Understand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Commentary on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the Center* by Qi Xisheng *Hou Zhongjun* (146)